



向汉娜·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人们》
致敬

黑暗时代的 她们

Women
in
Dark Times

[英] 杰奎琳·罗斯 著
王扬 译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可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2014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年度好书

我们将要横穿一片可怕的海峡
那里波涛汹涌
可我无所畏惧

黑暗时代的 她们

*Women
in
Dark times*

[英] 杰奎琳·罗斯——著
王扬——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暗时代的她们 / (英) 杰奎琳·罗斯著, 王扬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3
ISBN 978 - 7 - 5502 - 9298 - 7

I. ①黑… II. ①杰… ②王… III. ①女性 - 人物研究 - 世界 - 近现代 IV. ①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143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6 - 7561
Women in Dark Times
Copyright © 2014, Jacqueline Rose
All rights reserved.

黑暗时代的她们

项目策划 斯坦威图书



作者 [英] 杰奎琳·罗斯
译者 王扬
责任编辑 夏应鹏
策划编辑 李佳锐 肖宇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3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1 印张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02 - 9298 - 7
定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纠错热线: 010 - 82561773

序

是时候回归到对“女权主义”本质的讨论了。事实上，当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看待她们在现代社会所经受的风险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把握为她们所承受的一切划分出明确的道德边界。她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诉诸法律或向议会要求平等权利得到解决。尽管这样的方式很重要，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利于女权主义得到真正的理解。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无比重要的事实是，这种通过强制方式实现的“平等”，往往会使问题进入到更加不可解决的状态——当矛盾彻底激化时，那些原始的、濒于消弭的所谓“原始权威”甚至会因此而死灰复燃。对于女性来说，解决问题更好的方式，必定是继续争取自己应有的自由，但绝非是以没有理性的方式。

我所谈论的“女性”仅仅指的是“女性中的一部分”。任何女权主义者都没有权力声称自己可以代表所有女性。在本书中，我试图沿着那些曾教会我独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女权主义全新轮廓的杰出女性的生命轨迹，探讨女权主义的真实含义。一个人或许会支持女性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辩护，但当我们由问题的表面进一步去挖掘人性与历史的负面时，我们所可能触碰到的却往往是主流观念所不愿意面对的内容。我们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并以这样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讨论之中，从而还原这些故事的本质。我们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女权

主义，即将那些最卑鄙、最令人不快的内容也包含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而非一味地抗拒它们。这想必会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渴望的那种理性的、平衡的，那种所谓女性可以“自己主宰命运”的理想世界有所出入。这并非是由于这样的愿望本身不切实际，或是一个疯狂而卑鄙的世界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而是对于女性本身来说，她们就拥有看穿这世界的疯狂、冷酷无情，看穿人们往往会因利己而摒弃公平的真实模样的天赋。但出于对理想的狂热，女人们却更倾向于将自己隐约感觉到的这些掩埋起来，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去。

在性别平等主义者的口中，“个人即政治”显然已是老生常谈。这种观点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恰当地将注意力投向女人原本私密的私人领域，却在多数时候屡屡为“家族权威”侵犯。但或许是由于它主动回避了对这一问题里最关键的部分——“当我们谈论个人及私密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的讨论，它作为一种观点的价值，在今天正在渐渐褪色。事实上，对于苦难中的女性而言，她们承受的，并非只是来自暴力的侵犯，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目的性的匮乏。如果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的那些杰出女性，恰好满足了我所试图证实的观点，那正是因为她们都曾对人格的完整进行过无比艰难而卓越的追求。借由她们的梦想与噩梦，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最龌龊不堪的部分，而那恰恰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用托妮·莫里森的话说，“那些不可言说之物”。）

因而这部讲述女人们悲惨境遇的作品，同时也是一次对“女权主义”本身的反思。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最初的赌注：个人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为它添上新的注脚。对于女权主

义者来说，她们应当将自己在黑暗中遭遇和学会的一切告诉这个世界，而非一味地将自己的要求诉诸政治。事实上，当性别问题被放置在政治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时，它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使本就混乱的“政治圆桌”变得更加混乱。所有问题都应当在它自己的语境下被讨论，因此，比起如何通过政治参与改变性别问题的现状，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当性别平等者通过政治参与及其他手段使自己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时，这种意识究竟会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话语与观念产生怎样有意或无意的限制？

但当我试图寻找有关这个问题的线索时，我发现自己逐渐深入的是一个更加黑暗的境地：在我们的时代，女性所遭受的苦难，通常是隐性的、不可见的。基于此，我尝试遵循另外一条路径——通过把握那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女性的经历，来探讨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状况。我将第二部分视作一个尽管悲观但至关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一部分提供的案例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至今仍然未能摆脱“家族权威”统治的阴影。那些仍然屡屡发生的“荣誉杀人”事件，就好像是一道道刺眼的标记，嘲笑着女权主义者们自鸣得意的“成果”，以及天生乐观者对女性自由程度的错误估计。没有什么比那些可以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艳照”更有说服力了——而这类事件的受害者往往只能是女性。尽管我们坚信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至少可以维持“基本水准”之上的自由，但当矛盾真正产生时，这类事件却通常会包含某种“失控”的因子。当然，我们也绝不可以忽视，与这些“隐性伤害”相对的，那些对女性人格肆无忌惮的凌驾，仍然留存在我们的“文明”之中。

人们通常会将“荣誉杀人”事件归因于某种文化差异的结果，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置身事外。但在我看来，事实绝非如此。女性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文明并没有表现出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种优越性。女权运动的目的是为女性谋求平等和自由——尤其是在性关系中，但我们也要警惕这种倾向会演化成另外一种错误的极端。性关系中的纠纷，通常会被当作丑闻而被掩盖。可是当我们试图以解决为目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时，我们又会遭遇另外的尴尬：大多数旁观者只会将这类事件当作某种低俗的消遣品。“荣誉杀人”事件往往是现代社会中“激怒权威”最典型的例子。尽管文明产生的结果会对原本不受限制的“权威暴力”加以缓和，但一种来自欺骗的观点却会为滥用暴力提供有力的支撑——只是因为女性的愚昧和放荡，才使得这个世界如此不堪，于是任何“规训与劝诫”才变得必要且合理。

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曾因自己“大胆”的行为而受到警告。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作为早在启蒙运动中便被提及的“人类只要不懈地坚持理性，便足以驱散愚昧”的美好愿景，在今天依旧任重道远。可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女权主义者出于自卫的考虑，同样选择极端的、非理性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在黑暗中摸索蜡烛想尽办法点燃它，以光明驱散黑暗，不惜为此撞得头破血流，真正学会如何面对黑暗或许是人们在身处黑暗之中时更好的办法。如果说我将要讲述的这些故事里有一些值得人们借鉴的经验，那便是我们需要想清楚，我们努力想要寻找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这本书意在通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例，改变某些已经成形的、有关性别平等主义的看法。而通过讲述这些悲惨却隐含了无比强大力量的故事，我希望所有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对更美好的未来有所期许。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伟大的故事来说服我的读者，内心的力量，终将使我们战胜黑暗，成为更好的自己。

杰奎琳·罗斯

2014年4月

目 录

楔子 / 1

第一部分 巨星

1. 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 / 37
2. 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 / 87
3. 尊重：玛丽莲·梦露 / 127

第二部分 底层

4. “荣誉”使然：莎菲莉亚·阿梅德，赫苏·尤尼斯和
法蒂玛·萨西达 / 177

第三部分 生者

5. 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 / 241
6. 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 / 273
7. 损害之限：泰蕾莎·奥尔顿 / 299

后 记 / 319

致 谢 / 333

译后记 / 337

楔子

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赫苏·尤尼斯，2003年于伦敦

被自己的父亲谋杀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生命。

——艾娃·阿诺德（著名摄影师）

对玛丽莲·梦露的评价

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历又迥乎不同，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过气来——一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20世纪——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仍未消散。

我将她们视作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她们中的一位——德国犹太裔女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广为人知，但对于公众而言却十分陌生。1940年至1942年间，她以超乎想象的高效完成了千余幅水粉画作。这些作品以空前的手法，将音乐与绘画完美结合。但更重要的，是萨洛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完全倾泻在这些作品里。而我在最开始记述的人物罗莎·卢森堡，同样

也是位艺术家。她擅长绘画与创作诗歌，而她的政治演说和相关文本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由于她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 20 世纪头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至于玛丽莲·梦露，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在我看来同样应当以一位完美演员的身份得到人们的瞩目和尊重。一颗如此璀璨的明星——她不仅仅承载了好莱坞的梦想，同时也代表了战后美国人对美好的诉求，但最终却以悲剧的方式香消玉殒。

这三位杰出的女性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有理由成为女权主义的开拓者，并不是因为她们将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而是由于我坚信，她们的经历与经验，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 20 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

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植物学家。而根据我最近的发现，她还是位狂热的“自行车骑士”（她的同伴通常是伊迪丝·卡维尔，一位护士兼社会学家。她们曾一道参加1902年在法国迪耶普举行的一次为期六天的骑行活动）。在1905年和稍后的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由于自己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的决议不断背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她毅然决然地成为自己同僚们最坚定的批评者。于是以反对德皇以及反战等理由，她被人迫害，开始频繁遭受牢狱之灾，并最终于1919年，在自己所支持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政府追随者的一次谋杀。这些革命的镇压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个关键时刻：那些因为他人错误决定而折戟沙场、蒙受屈辱的士兵只能在此向使他们成为被害者的罪魁祸首——出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目的的罪恶战争投向匆匆一瞥，却无从讲出它的真实身份。而除了剥夺这些士兵的生命，这罪恶同样扼住了全世界工人的喉咙。“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接受野蛮剥削”是卢森堡的名言，而在她死后，野蛮剥削者们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庆祝。至于所谓的“自卫民团”的所作所为，则导致了更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森堡之死，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当罗莎·卢森堡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那将要感染众人的公开演说时，她缓慢但准确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在1898年写给自己情人列奥·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写道，“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

对于自己的这位情人，罗莎·卢森堡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当她总结自己的演说时，她发觉自己着力引导和改变的，其实还是那个本质上属于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瘦小、有一点跛足的波兰裔犹太女人，则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断向高处攀登。她与参与她演讲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权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宁，尽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却也曾被卢森堡当面指责。简单地说，罗莎·卢森堡征服了他们的世界。

与此同时，卢森堡同样不曾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坚定吗？”在几个月后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卢森堡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种政治理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本书的名字《黑暗时代的她们》（*Women in Dark Times*）正是源自后者的代表作《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那本书^①里，她写道：“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充分使用它”是当下女性权利者们眼中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信条。在最近的一次公共演讲中，女权主义专家玛丽·贝尔德也曾指出，对于那些在当下社会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女性而言，她们常常是以高昂的代价，才拥有了“仍不划算”的微弱的话语权。而在父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女权主义者的言论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之类颇为轻蔑的形容词，通过这样的谴责来使她们减少自己的发言。通常意义上，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即便不是以恢复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目的，也是在试图继续对女性的言论进行染指和干涉。一个直言不讳的女人总会被看作一种威胁，这并不是出于对她所说的内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担忧，而仅仅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太过强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对于言语而言，它的作用在于可以使人的肉体存在得到升华和解放，可以诠释更多的意义——但当言语

① 指《极权主义的起源》。——译者注

被女性利用时，这显然对既定的某种秩序或是约束构成了威胁，同时预示了某种“放肆”的可能。也正是基于此，罗莎·卢森堡的演说，时常会遭到反对者的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时也是位自诩的“女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像猴子一样抖机灵”。而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他常常会宣称卢森堡所做的一切并不明智，“证明了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党内大会上，阿德勒半开玩笑地说：“是时候让她停下来了……不能让一个蠢女人坏了我们的好事。”罗莎·卢森堡所遭受的诽谤表明了，一个卓越而勇于发声的女人的存在，通常会被包括同僚在内的男人们看作一种威胁。而这种境遇本身也证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实从未消失。

我猜想，女性会遭到如此广泛的憎恨的原因——我同时把它看作女人们的天赋，是她们通常都会具有在个人体验层面推动日常生活“由表及里”的能力。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加现实，也更加坚韧，这使得她们可以更从容、更柔和地处理生活中的波折。但如今愈加强调“性感”的审美倾向却显示了某种隐性而致命的控制意图：肉体的完美被再度强调，同时也伴随着对暴露的要求。我将此看作对女性的诱骗和干扰。如此理想化，同时又是如此的贬低化（这两个极端必然相伴而生）的审美要求，隐含了一种看似不再可能，却依然阴险、难以揣测的目的：我们的身体不应当提醒我们自身的缺陷，从而使我们找到自我控制或是了解的极限。而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不安也就此被掩

盖。至于身体上的负担，则被梦想与梦魇稀释。然而，基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女性作为承担者的使命却不仅仅使她们自己受益。她们往往会成为全人类由黎明前的黑暗到达真正光明的引渡者。当男性疲于争斗时，女性的敏感却会使她们体验到更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勇气，会使她们肩负起超乎想象的重要使命。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我的灵魂正在因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当罗莎·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人们大都会将卢森堡之死归因于1918年斯巴达克派起义的失败——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次在1915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而在刑满之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谨慎支持的态度。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①中这样写道，“去相信我们

① 即《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译者注